

亟待破局的国企混改共享分红制

“按资分红和按劳分红是科学、合理的，在国企也是易于操作的，因为不涉及改制，不涉及产权，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，不涉及员工下岗，不涉及比较复杂、比较严格规范操作的流程。”周放生如是表示。

他认为，“共享制分红”是给国企员工一个利润共享预期，是目前推动国企改革非常好的突破口和抓手，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应该允许试、鼓励试。

困惑：基层质疑与地方政府消极应对

“企业长期赢利一切都好，一旦出现亏损或不赢利，员工出现负面情绪影响更大。”曾进入世界500强、下辖50多家二级企业的河南某地市级国企中高管贾姓人士向《企业观察报》表示，花无百日红，企业不可能一直在增长。如此改革，扯皮问题就会随之而来。

企业效益好了，职工认为是自己干得好。效益不好，职工会埋怨企业负责人或管理团队管理不力，或者是市场环境造成的亏损，而不会认为是自己没干好。

贾姓人士表示，以今年受疫情大环境影响为例，多数企业经营发展不理想，在风雨中徘徊，部分持股职工就可能拿经营发展好的企业作对比，对企业管理层提出质疑与问责。

一旦矛盾升级成群体事件，对国企

的社会影响力就会带来更多负面影响。

不仅是企业担心，职工亦然。

上述贾姓管理者对《企业观察报》分析，无论是期权还是股权，如果让员工掏一部分钱去购买，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。

他说，基层员工想法很复杂，一方面认为自己掏钱买股权，却在企业经营中没有话语权；同时对企业管理团队的管理能力与水平也会提出质疑，担心其是否会对企业诚心经营，或者会坐吃山空地熬日子。

“主要还是职工把钱给企业不放心，认为把钱抓在自己手里比较实在，可自由支配。”贾姓管理者表示，职工拿钱买完股权后，却觉得没有话语权和主动权。

其次是分红。每个企业的财务状况都不一样，部分企业有调账的可能。职工无法知道企业财务的真实情况，这也是一道能否放心购买股权的心墙。

同时，国企改革更大的阻力，或许并不是企业与职工的担忧，而是地方政府不积极的态度。

作为曾经进入世界500强、有50多家下属二级公司、在职员工15000多人的地市级国企，竟然没有企业骨干、职工持股。

“对202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国企改革方向和要求，我们企业一直没有传达。”贾姓管理者表示，具体原

因尚不知晓。个人推测，或是地方政府也不想推进国企混改。

“一旦全资国企成为民营或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，地方政府想再对国企指手画脚要钱，就没那么方便了。”这位贾姓管理者表示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地方国企还担负着缓解地方政府经济压力的重任，一旦混改后，政府就会陷入两难境地。

以上只是地方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、职工持股的部分难点。事实上，还有国有资产评估价格核算、职工持股认定等一系列流程，需要逐个攻破。

成功案例：EMS脱困的金钥匙

虽然仍然存在诸多困惑，但在具体实践中，企业亏损后，职工负面情绪影响与质疑并不是无药可医。

“企业每月进行财务状况公开就好。”孔凡对《企业观察报》说，如此一来，生产经营中的成本、消耗、毛利率、净利率等指标，都能让员工充分明白与掌握，更加了解企业运营状况。例如中联水泥，就早已实现财务公开透明化。

“下道工序是上道工序的买方，上道工序是下道工序的卖方。”孔凡表示，作业流程上的环环相扣，会让员工知道，控制成本的关键环节是什么，毛利率与净利率是如何获得的。

孔凡说，就像企业网格化管理一样，广大员工会有一个明确的努力方向。

不仅是职工持股后的定期分红，企业对职工进行利润分红的方式方法，也可以是灵活多样的。

例如，中国邮政速递物流EMS的“共创共享”，在经营利润超出目标后，对职工进行奖励的“共享分红制”，就成为助力国企脱困的一把金钥匙。

随着顺丰、德邦、中通等快递物流公司的异军突起，EMS全国3800多个营业部经营艰难、亏损严重成为不争的事实。

2015年，邮政速递物流两次发文提出，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市场可采取经营责任承包制，以创新经营和激励机制，激发终端创收经营单元的积极性，在河南、安徽两省率先试点“共享制分红”，并在年底实现业绩大幅增长。

2015年底，邮政速递物流将经营责任承包模式升级，顶层设计定义为“众创众享工程”，作为邮政速递物流2016年和“十三五”期间的重大工程推进。

可查询数据显示，截至2017年9月底，EMS全国经营单元众创众享覆盖率达到80.6%，二级众创众享单元近9000个。

周放生对EMS“众创众享工程”进行调研显示，得益于“共享制分红”的改革模式，EMS的2016年总收入324亿元，比2015年增长17.1%；2017年总收入比2016年增长28%。

以EMS北京永安里营业部为例，周放生进行了具体分析。

2016年，该营业部亏损261万元。2017年负责人竞标上岗，将亏损降低至91万元。如果增量减亏（增量利润）奖励为五五分成，国有资本拿50%，营业部负责人拿20%，职工拿30%。2017年7月，营业部从巨额亏损实现收支持平，并在当年年底盈利20万元。

根据上述“共享制分红”机制，周放生为该营业部算了一笔账。

与2016年的亏损261万元相比，实际赢利281万元。考核指标是亏损91万元就合格，如果盈利20万元增量就是111万元，职工拿111万元的一半是55.5万元，国有资本则拿225.5万元。

“如果没有‘共享制分红’激励制度，EMS或许继续亏损，可能亏损261万元都打不住。”周放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企业没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，只是改变了激励机制，就产生这么好的效果，可以看出机制改革的作用有多大。

“前提是，一切都应基于公开透明的管理制度与财务之上。”孔凡如是表示。

“新时代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伟大创新就是，让劳动者和资本的对立关系变统一，让国家和职工的利益相统一。”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、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对《企业观察报》表示，一定要实现股份制基础上的按份共有，具体量化到每个员工身上，使其真正成为分享企业利润的主人。■

后疫情时代，通胀还是通缩？

作者 沈建光

疫情冲击之下，通胀还是通缩的讨论引发关注。

一方面，前期国内为抗击疫情而采取的企业限产、阻隔交通等措施，遏制病毒传播的同时冲击了供应链，加之疫情之下生活必需品和医药防护用品的需求急剧增加，相关商品价格明显上涨。当然，伴随着三月以来国内疫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，复工复产加速推进，国内供应链不畅的情况已得到缓解。然而，海外疫情仍在蔓延，各国宽松的货币政策、防疫之下的粮食出口限制，以及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等增加了输入性通胀的担忧。

另一方面，当前国内需求仍然不足，基于新冠病毒传染率高、潜伏期长、且有不少无症状感染者存在等特性，国内防疫工作仍然艰巨，防疫进入常态化使得短期内国内经济活动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，特别是餐饮、旅游、酒店、交通等行业仍将面临一段时间的需求低迷，并通过产业链影响上下游企业的订单，加深通缩预期。

那么，后疫情时代，价格走势会如何？政策层面又会面临哪些调整？笔者从供求关系、成本压力、货币政策、输入性通胀等多个影响通胀走势的角度入手，分析未来一段时间，中国经济活动面临的突出问题，短期中国通胀压力较为可控，不足为虑；相反，工业生产领域的通缩风险值得关注，需要出台配套的政策加以应对。

需求不足是通胀难起的主要因素

今年以来，新冠疫情来势汹汹，短期内，给社会商品供求关系带来了巨大的外生性冲击。即从供给来看，常态化的防疫工作冲击供应链，一般性生产活动受到影响。而从需求角度来看，疫情之下，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增加，生活消费品受到抑制。同时，企业下游订单的减少也对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的需

求产生抑制。

根据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原理，短期内供需曲线移动引发价格波动。不同商品受疫情影响，供需变化有明显差异，如必需品和医疗物资需求旺盛，且供给阶段性紧缺，便出现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。可选消费品和工业原料，由于整体生产需求在放缓，供给没有对应收缩的背景下，价格反而持续下跌，今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走低，甚至出现5月期货结算价跌入负值的极端情况，背后就有需求不足，OPEC减产有限的考虑。

展望未来，伴随着国内复工复产的全面铺开，后疫情时代，需求不足压力要明显大于供给。结合一季度经济数据来看，需求端的恢复也体现出明显滞后于生产端恢复的情况，如3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为-11%、较上期大幅跃升124个百分点，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仅为-15.8%，且较1-2月仅回升47个百分点。

与此同时，在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的背景下，未来外需也会感受到压力，特别是电子、纺织、仪表等外需敞口高的行业。同时，娱乐、旅游、餐饮等服务性消费也会经历相当长时间的低迷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通胀压力不大。

成本端压力对通胀影响较为可控

近期企业复工后，出现部分企业基于原材料、租金、人力和消毒防疫等成本端压力加大，提高终端商品售价的现象。在笔者看来，这种现象仍然是局部的，未来成本端推升通胀的压力不会全面出现。

原因在于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，疫情之下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压力，工资下降和隐形失业的担忧仍是主要困难；二是复工复产下，供应链紧缺已得到缓解，前期原材料紧缺导致的价格上涨有所缓解；三是政策推动租金、利息等要素成本下行。可以看到，疫情发生以来，为减轻企业负担、保障企业生存，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级政府纷纷出台纾困政策，包括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和实施

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政策、减免中小企业的厂房、写字楼、商场租金等。

疫情之下的宽松政策旨在纾困实体经济

政策宽松往往会引发通胀担忧，疫情之下，各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积极的政策，但在笔者看来，这些政策仍旨在输血实体经济和防范大范围失业，是应对疫情外部冲击下的必要举措，短期内不存在流动性过剩，或者经济过热的担忧，也不会引发通胀。

比如，货币政策方面，当前全球至少35家央行降息，美联储将政策利率降至零并启动“不限量QE”，购入国债、市政债和企业债；欧洲央行开展7500亿欧元的“疫情紧急购买计划”，日本央行推出1014亿日元的股票ETF购买计划。全球央行协调行动，通过长期美元流动性互换安排等。财政政策方面，美国推出2万亿美元的超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；德国突破财政红线，推出7500亿欧元财政刺激；意大利、法国、英国、日本、韩国等受到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，也均推出了相应的财政刺激计划。

就中国而言，疫情以来中国央行，也通过调降超额准备金利率、MLF、LPR利率等方式引导资金下行，通过再贷款、再贴现、MLF等释放流动性。同时，监管政策也进行相应的逆周期调整，以缓解企业还本付息压力。在财政政策方面，除了财政贴息、融资担保、减税降费、提高赤字率、提前下达专项债等方式，中国政府也将启动抗疫特别国债，预期规模达到2万亿-3万亿。

在笔者看来，疫情冲击下，紧急大规模的财政、货币、公共卫生政策，社会保障政策都是十分必要的，是应对短期疫情冲击，托底实体经济、输血市场和企业的需要，有助于防范因为资金链断裂造成的企业倒闭、工人失业，避免经济衰退通过资产负债表传导至金融机构，引发新一轮金融危机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宽松政策是防范经济衰退和通缩风险，

而非通胀。

输入性粮食价格通胀可控

当前海外疫情仍然严峻，全球确诊人数逼近300万人，部分国家为应对疫情、保障内需开始限制粮食出口，部分农产品价格大涨。截至4月23日，CBOT稻谷期货价格已经飙升至15.37美元/英担，创六年来的新高；CBOT小麦价格也较3月初明显上升，报544.75美分/蒲。

尽管这样，在笔者看来，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是有限的。原因在于，一方面，稻谷、小麦等农产品中国的进口依赖度较低，且库存充裕，国际价格上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。比如2019年，我国稻谷、小麦的自给率（产量/国内消费量）高达98.5%和118.2%，实现自给自足。2019年，稻谷和小麦的库存消费比（年末库存量/国内消费量）分别达到85.1%和91.1%，基本可以支撑10-11个月的国内消费。从国内价格来看，尽管国际价格上涨，但3月之后，国内粳稻和强麦期货冲高回落，与外盘走势不同，国内外市场的联动性较弱。

另一方面，虽然农产品中，大豆对外需求大，玉米国内库存相对有限，但当前国际价格仍然处于低位，供给压力并不突出。2019年，我国大豆的进口依存度为85.2%，库存消费比为7.8%，理论上受外盘价格的影响更大；玉米进口依存度不高，只有1.7%，但库销比比较低，目前为46.8%，约为5-6个月的消费。但是，3月以来，CBOT大豆和玉米价格明显回落，供给并非出现明显收紧。此外，近期有报道称，我国正在考虑增加农产品进口，特别是大豆和玉米。在国际价格远低于国内的背景下，这也有利于缓解国内粮价的上涨风险。

重点商品价格监控显示通胀压力减轻

基于上述分析，笔者认为，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主要粮食品种的冲击不大，无需过于担忧粮价对CPI的扰动。

过去几年，CPI粮食分项同比低位窄幅震荡，最近一年其平均权重也仅为1.83%，对CPI的拉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

CPI的核心变量依然在于猪肉，3月CPI猪肉分项同比达116.4%，拉动CPI同比约2.79个百分点（贡献率约65%）。在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共同作用下，二季度猪肉供应面临较大压力，猪价涨势或将延续。但伴随基数快速抬升以及母猪存栏持续回升，三季度猪价同比可能见顶，年内CPI有望逐步回落，通胀风险趋于缓解。

工业品价格的通缩值得关注。疫情之下，交通运输、工业生产受到影响，如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最新分析，预计2020年航空公司客运收入暴跌3140亿美元，同比2019年下降55%。经济活动低迷使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回落，国际油价持续走低。据国际能源机构(IEA)预计，4月石油需求同比减少2900万桶/日，尽管多番博弈下OPEC+终于达成史上规模最大的减产计划，但由于不足以弥补需求缺口且实际执行情况存疑，油价短暂反弹后再度回落。油价低位使得石油及相关产业链价格走低，比如油气开采、石油煤炭加工、有色和黑色加工、燃气生产供应、化学制造等，预期国内工业品通缩态势仍将持续。

综上，疫情之下，笔者认为，今年通胀不应过度担忧。相反，防范更广泛领域的通缩风险，是未来政策考虑的方向。危机情况下，充分激发国内市场活力、扩大内需，除了更加积极的财政货币支持以外，有针对性的救助政策和定点帮扶避免大面积失业，发放消费券甚至是现金引导消费，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尽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化，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。此外，加快要素改革，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，全面放开外资和民营企业准入限制等更是激发国内经济活力的关键。■

作者系京东集团副总裁，京东数科研究院院长，首席经济学家原文首发于FT中文网《沈时度势》专栏